

党史上的政治纪律建设

□ 库德华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焕发旺盛的生命力，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与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密不可分。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在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加强和维护党的领导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将政治纪律作为维护党的领导的有力武器。建党伊始，我们党在一大纲领中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是最早以政治纪律形式维护党的领导的規定，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注入优秀基因。党的二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首次以政治纪律的方式确立了党的领导。从党的三大到五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内容不断丰富。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宜重视政治纪律”，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政治纪律。八七会议提出，“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强调以严厉的政治纪律执行维护党的领导，使我们党没有在白色恐怖中迷失，迅速掀起革命新高潮。古田会议上，针对部分党员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党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的领导机关要成为“领导的中枢”，以严格的政治纪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加强和维护党的领导的重要时期。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1941年，党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统一意志、

行动及纪律，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在延安整风的具体实践中，党开创了“坚持用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的政治纪律建设新范式。1948年我们党为迅速克服党和军队内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建立健全了请示报告制度。这一时期我们党还与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行为作坚决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继续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将全党服从中央、全国一盘棋思想付诸实践，以政治纪律严肃处置了一批破坏党的领导的违纪分子。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重大党建命题，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政治纪律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要求”。

健全党内法规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仅仅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守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党内法规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断推进政治纪律建设的制度化。毛泽东最早提出“党内法规”，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在建党以来党内法规初步建立的基础上，直面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纪律建设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支撑政治纪律运行，将政治纪律建设的制度“笼子”扎得更加严实。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主要任务包括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政治纪律的党内法规，是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了被称为“民主革命时期最好、最完备的”七大党章。这部最根本的党内法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政治方向上明确党的政治纪律；强调“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政治路线上明确党的政治纪律；

规定“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在政治原则上明确党的政治纪律；首次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政治责任上明确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的要求，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在政治纪律制度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对党内法规的独特作用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党内法规建设成为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核心和关键；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党内法规的刚性约束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坚持严明执纪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严明执纪是相得益彰的。毛泽东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既要明确规范，又要严格执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党的五大提出“政治纪律”后，并没有与之匹配的明确执纪规范，许多干部不清楚其违纪边界和执纪规范，造成了执行上的过左、过杂甚至凭主观臆断的情况，这样的执纪显然无法保障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明确执纪规范依赖民主集中制保障下的党中央科学决策，严格的纪律执行确保的是中央的权威，两者有效结合后的执纪严明，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保障。延安时期，我们党科学把握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要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而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这一时期，我们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则，领导集体的科学决策保证了执纪的明确规

范。同时，强调政治纪律的严格执行，毛泽东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对党内违反政治纪律的张国焘、王明等严肃查处，维护了政治纪律的权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执纪严明作为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保障，提出“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通过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以规范严明的政治纪律确保其得到党员干部贯彻执行。

优化工作机制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还需要通过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来提升政治思想、提供监督保障、创设环境氛围。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通过红军基层政治工作来确保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并开展党的基层政治工作，将其纳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范畴，在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上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优势。

延安时期，我们党将抓住“关键少数”作为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必要措施。1940年，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这一时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遵守政治纪律上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既有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因审干扩大化错误的主动担责，又有陈云在回复王明提出不合理要求时的“一视同仁”，还有对罗章龙、刘振球等人的严肃执纪。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发展创新，将开展集中教育作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关键性举措，在全党开展了6次广泛的、集中性的教育活动。2024年4月至7月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必将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红军封竇铺阻击战纪念碑位于四川省营山县明池镇西北十五公里处的琵琶山上。纪念碑为整块花岗岩石，正面镌刻有“红军封竇铺阻击战纪念碑”11个镏金大字，长5米、高3米、厚0.6米，重量在12吨以上。底座共由3块景观石组成，上面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为粉碎国民党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部队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红军决定在封竇铺阻击敌人，保证红军主力部队和苏维埃机关安全转移。

封竇铺位于营山县城西北十五公里处，素称“营山锁钥”，为军事要地。要打好阻击战，必须夺回已被敌人抢占的琵琶寨。

十一月二十日，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从营山县城西门出击直逼琵琶寨，多次发起冲锋均受挫折，伤亡甚大，前进困难。当晚，红九军军长何畏亲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前往增援。通过侦察，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乘夜袭击敌军。红军一是部署大部兵力在山下埋伏，做进攻准备；二是组织小分队摧毁敌人主要火力，并找到了当地游击队员带路，从东门堰壑绕道南门，搭人梯，攀葛藤上到山顶，出其不意地干掉了东门寨子上敌人的机枪手，同时吹响了冲锋号，埋伏于山下的红军战士立即冲上了敌阵地。顿时，枪炮声、喊杀声、惊天动地，火光映红了夜空，敌兵纷纷丢枪弃炮，仓皇逃窜，红军终于夺回了琵琶寨。

二十一日凌晨，浓雾弥漫，敌人组织了六十多人的“敢死队”，企图趁晨雾偷袭琵琶寨。敌人刚进入寨下的望月梁，埋伏于两旁丛林中的红军战士突然杀出，歼敌三十多人，打退了敌人的偷袭，红军将士乘胜追击，连续攻克了观音岩、狗头寨等高，将敌人撵至营（山）蓬（安）交界的滑石板、烂寨子。

为了更有效地遏止敌人的疯狂进攻，红军决定夺取狗头寨与烂寨子之间的泡儿山。二十二日凌晨，红军分三路一举攻克了泡儿山。是夜十二时红军主力按命令主动撤出封竇铺，只留下一加强连在狗头寨坚守阻击，掩护大部队后撤。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在狗头寨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完成了阻击任务，趁浓雾未散，分批撤出了阵地。

封竇铺阻击战，红军坚守了三天三夜，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掩护红军主力撤退和营山苏维埃政权的安全转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先烈，发扬红军精神，建设美好家园，走好新的长征路，特立碑纪念。

营山县人民政府
二零一六年十月立

碑文交待了封竇铺阻击战的背景，详细记叙了战斗过程，高度评价了这次阻击战的重要意义，阐明了“立碑纪念”的目的，读来仿佛又回到烽火硝烟的年代，心灵受到一次红军精神的洗礼。

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12月进军川北后，经过10个月的英勇奋战，取得多次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对入川红军的发展惊恐不安，委任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匪”总司令，集结四川大小军阀20万人，向川陕苏区发起了“六路围攻”，驻扎在营山的红9军主动向长胜、巴中方向收紧阵地，在撤退中，他们依山凭险，寻找战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战斗，封竇铺阻击战就是其中之一。

1933年11月16日，国民党第四路总指挥杨森率20军向营山、仪陇发起攻击。面临强敌压境，周口前线的红9军和游击队开始作战略转移，退到营山境内的封竇铺一线，敌军尾随进入封竇铺附近。同时，敌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率新编第6师9个团，由南充渡嘉陵江，从东侧一线抵达封竇山，副总指挥罗泽洲率第26师9个步兵团共1.5万余人，在蓬安金溪到富利

川陕革命根据地南线决定性之战——红军封竇铺阻击战纪念碑文敬读

□ 张雁

场一线偷渡嘉陵江，并夜袭沿江游击队。为了扼守要地，保证县委和苏维埃机关安全转移，红9军司令部作了严密部署，决定利用封竇山阻击敌人，夺取已被敌人抢占的与琵琶山紧连的琵琶寨。

11月20日，红9军25师74团1营，从营山城西门出击，经大河、观音岩、南溪桥，往封竇铺阻击，他们从琵琶寨的四方碑商楼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地形和武器均处于劣势，红军多次发起冲锋都受挫折，伤亡很大。

当晚，红9军军长何畏亲率25师73团前往增援，他来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了解进攻情况，通过认真研究，决定乘夜偷袭。红军找到了熟悉当地路径的游击队员唐克俊等同志，立即组成摸夜螺队，由唐克俊带路，从东门堰口绕道南门，搭人梯、攀葛藤而上，上得山顶，匍匐前进，躲过了岗哨，迅速从琵琶寨山顶直攻东门，出其不意地将敌在东门寨子上的机枪阵地一举摧毁。与此同时，红军各个阵地上冲锋号一齐吹响，埋伏于山下的红军战士立即冲上了寨门。山上敌兵以为神兵天降，拼命逃窜，在西门北门的悬崖边，摔死数十人，其余均缴枪投降，一个营顷刻瓦解。红军占领琵琶山后，何畏一边命战士连夜赶筑工事，准备坚守，一边命部队打伏击。

21日凌晨，浓雾弥漫，敌人组织了“敢死队”，由观音岩经凉风垭、望月梁，企图趁晨雾偷袭琵琶寨。敌人刚爬上望月梁，埋伏于两旁丛林中的红军战士突然杀出，用长矛、石块、手榴弹歼敌3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偷袭，余下残敌连滚带爬逃回了观音岩，红9军战士又乘胜追击，连克观音岩，中午，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观音岩高地。

22日早晨，红军主动对泡儿山的守敌发起进攻，在第一次冲锋失利后，红军分别从右侧佯攻、正面强攻、左侧巧袭，一举攻克泡儿山。敌军又数度发起反攻，红军指战员英勇阻击，鲜血染红了山头。当晚，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封竇铺，只留下一加强连在狗头寨阻击，掩护大部队后撤。23日上午，担负阻击任务的红军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在雾色中撤离了封竇铺阵地。

封竇铺阻击战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安塞马家沟村的读报活动

□ 杨晓萍 张欣毅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教育活动。读报作为群众教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萌发于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扩展为读报运动，延安时期更加深入群众，通过将个人读报行为上升为集体组织行为，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普遍化大众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动员的重要手段。其中安塞县马家沟村的表现尤为突出，成为边区文教大会中唯一获得特等奖的读报组。

马家沟读报组的创建响应了读报工农化的号召。一方面，读报是党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自1941年7月中央宣传部明确建立党外读者会和党内的读报制度，读报运动率先在干部和学校中展开，1944年开始逐渐实现工农化，马家沟读报组成为其中的引领者。另一方面，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工作方针，党报从版面、内容、文风等方面更加联系群众，鼓励工农群众参与办报，为读报工农化提供了前提和动力。

马家沟的读报组是由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陈德发组织发起的。1943年底陈德发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为了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创建模范村和模范乡，回村后他开始积极筹划村里的生产文化工作。在收到

报社寄发的一份《边区群众报》后，陈德发与区领导协商决定在马家沟成立读报组，以便配合生产组织事宜。1944年2月15日，陈德发召集6名村干部及积极分子共同商议确立了读报时间、地点和人员分工，明确由文化水平最高的村民担任组长，并布置好桌椅板凳、标语画像等，次日就成功开展了村里第一次读报活动，有15人参加，一个月后全村村民参加。

马家沟读报组不仅在创建的时候得到区里干部的指导，而且在1944年2月至6月间开展的36次读报活动中，县、区、抗联和民教馆共计25人参与15次，曾在安塞县工作的午人回忆：“我们早晚随时去那里看，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帮助总结经验”。5月1日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亲临讲话并颁发奖项，以此激励村民的读报和生产热情，并将马家沟读报经验在全县广泛推广。

刚开始每当报纸发下来，区里先用红笔圈定应读的文章，由读报组组长给村民先解答题目，随后每读完一段，就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解释意思。读报完成后开始识字学习，实现读报与基础文化教育相结合。活动组织三四次后，在群众提议下增加了讨论环节，每次读完报后村民先自行交流，再于下次读报开始时进行集体讨论。最终形成的

“讨论一读报一解释一识字”流程，不仅解决了群众看不懂读不懂的问题，实现了从个人自由读报到集体有计划有目标的政治文化教育的转变，而且对讨论环节的重视提升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密切了读报与实际生产生活的联系。

读报组学习讨论劳动英雄事迹和生产方法的次数最多，同时通过读报学习党的政策。比如，安塞县委除草指示，西北局开展卫生工作决定等。从1944年3月开始，每月读抗战最新消息两次。此外，还阅读移民、改造、卫生、反巫神，以及植棉、防害虫等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关消息。当然，本村消息也是读报的重点，比如学习《解放日报》报道的马家沟读报情形。

读报活动正常隔天组织一次，每次晚上通过打钟召集，全村在固定场所集体阅读讨论。但到农忙时节，读报组以扎工队、变工队为单位，分为两组进行，时间上3天1次，甚至5天1次，有时晚饭后在家里，有时中午休息时在山上。识字也改为晚间记公账时进行，最忙的时候从集体强制学习变为自主自愿学习。这种灵活的方式将读报识字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和组织活动中之中。

通过读报熟悉党的政策、模范事迹、抗战消息等，群众更加了解和爱戴共产党。例如读报组学习《组织起来》，认为共产党都愿意扶

助落后分子成为好人，“我们更应该加油劳动，若不好好劳动真对不起毛主席给咱们的好谋划”。全村提高了生产计划，强化了生产运动，比如提出开荒竞赛，全村分为4个组，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相互竞赛，劳动风气活跃，村里出了四个县里的劳动模范。

马家沟的读报与识字是一体的，从读报的第二个月起，每个组员制订识字计划，每次学习2—5个字，并在月终进行测验。全村掀起识字竞赛，青年积极分子张仲和1个月120字的学习计划成为全组的竞赛目标。即使在农忙时节，村民们也在地里巩固背诵，相互传授。经过3个月学习，全村人都开始识字，其中2人识字300字以上，3人200字以上，2人100字以上，其余在100字以内。

读报组不仅以党报为纽带，成为基层文化和政治教育中心，而且随着读报活动重要性的提升，逐渐成为基层治理中心。比如，读报组为解决难民事宜，提出全村筹措土地、腾出公共窑洞、帮助生病的难民种地做饭等互助方案。此外，读报组的功能逐渐延伸到村民日常事务管理之中，原来村里的纠纷需要到政府协商，随着群众对读报组的认可，读报活动最后增加了解决问题环节，这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读报组的重要地位。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